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卢阳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kaogufaxian@vip.sina.com
2024年1月19日

# 世界屋脊上的远古家园

## ——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梅龙达普史前洞穴遗址

梅龙达普洞穴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城南约30公里森格藏布（狮泉河上游名称，出国境为印度河）左岸的石灰岩山体上，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狮泉河平面104米。该地处于藏北羌塘高原西部地区，地势高亢，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梅龙达普藏语意为“腰间的镜子”，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一号洞开口朝南，规模宏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堆积由外向内倾斜，从中部到后部形成一个陡坡，最大落差近5米；二号洞开口朝向东南，规模较小，面积约60平方米，堆积基本水平，由内向外略倾斜；三号洞开口朝南，规模最小，面积约25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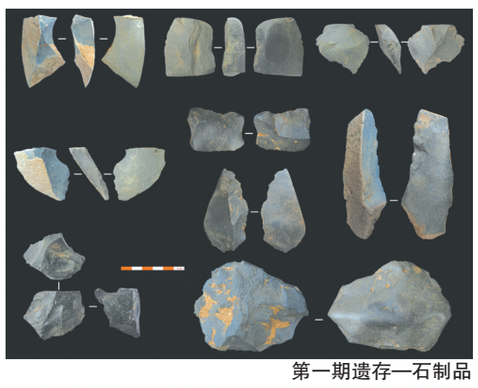
该洞穴的史前文化遗存于2018年7月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发现，属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2018-2023年期间，考古队连续开展了6个年度的考古发掘。目前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已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一号洞壁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手掌以及太阳等以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考古队还对遗址所处的革吉盆地进行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30余处、洞穴地点6处，采集到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另外还有5处洞穴岩画遗存，显示以梅龙达普遗址为核心的遗址群代表了该区域长时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历史。

发掘工作按照1米×1米探方展开。以自然层为主，在自然层内按照2-5厘米的水平层逐层发掘。记录所有遗物和遗迹的空间坐标。对洞穴规模与形制、重要遗迹与地层进行多视角三维重建，并对所有发掘出土的堆积进行细筛和浮选。

截至2023年，梅龙达普遗址共发掘10个探方，在一号洞和二号洞不同部位揭露出三套文化遗存（三号洞尚未进行考古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石制品技术特点等因素综合判断，一号洞中后部、二号洞和一号洞洞口部位的堆积分别代表由早至晚三期人类占据洞穴的历史。

第一期遗存：一号洞中后部主探方T8发掘面积64平方米，发掘至底部巨大灰岩角砾石层，深度为7.4米。主文化层出露于距地表2.7-6.6米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599件和动物化石1017件。石制品为英安岩制作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尺寸偏大、石核利用率低、修理较为粗糙，呈现出较早阶段石核-石片技术打制石器的特点。动物化石数量大、保存佳，其中以有蹄类动物骨骼为主。较多的标本表面可见明确的石制品切割痕迹，这为探讨早期人类的生计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一号洞中后部堆积的系统测年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石制品所反映的技术特点看，应早于二号洞堆积的年代，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该期遗存早于距今5.3万年，甚至可能早至距今8万年左右。

第二期遗存：二号洞主探方T1发掘面积12平方米，已发掘至基岩，深度为2.2米。文化层底部距地表1.5米。主要文化遗存为石制品8136件、动物化石952件，此外还出土少量动物粪便和植物遗存。二号洞T1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是石核-石片技术生产的打制石器，原料以英安岩为主。石器组合完整，存在大量碎屑。石制品整体尺寸较小。单面向心剥片的小型盘状石核独具特色。石片形状不规则。工具多以较厚的石片为毛坯，进行精致修理，刃缘较陡。器物类型丰富，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钻器等。T1出土的动物化石破损风化比较严重，但初步观察仍发现有与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相关的切割痕迹。综合石制品、动物化石、地层和出土物产状分析，这里应为一处古人生活留下的原生堆积。根据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二号洞主文化层不晚于距今4.5万年。


第一期遗存—石制品

一号洞岩画

第三期遗存：一号洞洞口主探方T3发掘面积为10平方米，发掘至底部大角砾层，深度达7米。文化层底部距地表1.5米。主要文化遗存为石制品1170件、陶片622件和动物碎骨4350件，同时还出土骨柄石刃刀、骨针、青铜小件、网坠等。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主文化层距今4000-3000年，顶部层位距今1000年。一号洞T3出土的打制石器以使用压制技术剥片的细石器为主要特征，含锥形和半锥形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精致加工的边刮器、端刮器等。石料多见优质的燧石、玛瑙和黑曜石。出土陶器可分两组，第一组是在黄褐陶上饰红彩、黑彩的彩陶器；第二组为灰褐陶上施刻划纹、圆圈纹、戳印纹、弦纹、篦点纹等。可辨器型主要有喇叭口器、侈口罐、直口罐、圜底器、浅饼足碗，和一件疑似尖底器。部分陶器可修复拼合，多数陶片外壁有烟炱痕迹，部分内壁存在残留物，推测为火烧烹煮产生。串珠、骨针、网坠、鱼骨和大量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遗存为复原4000年前人类的生活场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穴保留了多期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遗存，古人在距今5万年甚至8万年前就在此生活，其间由于气候因素或洞穴坍塌等原因而离开，后期又再度居住。多期的文化遗存为探讨远古人群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与演化、徙居模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距今5-8万年以前、距今4.5万年和距今4000-3000年等关键时段的文化遗存则为解决人类最早登上高原腹地、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动植物资源驯化利用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

梅龙达普洞穴发掘出土的丰富的石制品、陶器、骨器等文化遗存为探讨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不同时段的打制石器技术、类型和功能的对比研究将为旧石器时代人类拓殖高原、石器技术演化、生存策略转变和技术交流带来新认识。陶器类型的多元化与复杂性也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群构成和不同人群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历史提供了新证据。石器原地制作、陶器使用等方面的证据实证了早期人类以此为固定居所的洞穴利用方式，提供了极端高寒环境中人类长期占据高原腹地的关键性证据。

在羌塘高原西部寒冷干燥的独特环境中，梅龙达普洞穴保存了大量动植物遗存、微体化石和沉积物DNA。特别是大量动物化石的发现，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属首次，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动物遗存上还保留有清晰的人类取食行为所形成的切割或砍砸痕迹，信息明确、价值重大。洞穴出土的农作物种子，如青稞、豌豆等，极为珍贵，对于研究高原极端环境下农业起源与扩散，或者不同海拔区域人群农产品的交换关系及人群流动，意义重大。对探讨遗址性质、先民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古环境背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团队正在针对这些材料开展动植物考古学、古环境学、同位素分析、古蛋白分析、沉积物DNA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其成果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世界屋脊上远古人类生计模式和文化特点的认识。

狮泉河上游以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群，面积近万平方公里，包括旷野和洞穴两种类型的遗址三十余处，从数万年前绵延至距今千年，出土物涵盖石器、陶器、骨器、动物化石、动物粪便化石、植物种子、木头残片等多种文化元素，是西藏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乃至世界范围内高海拔地区罕见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梅龙达普洞穴出土的石核-石片石器、细石器和陶片等文化遗物与其他地点的标本具有相似的文化面貌。在这个大型河谷内的洞穴-旷野遗址群中，梅龙达普洞穴为古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居所，而周边旷野遗址和小型洞穴则是临时活动营地或短期居所，在海拔4600米上下、极端高寒缺氧的高原腹地，构建起一个古人类长期稳定生活于此的远古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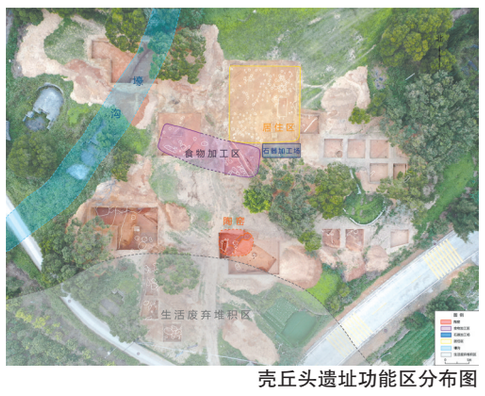
作为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超大型史前洞穴类型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长期、多次被古人占据利用，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它和周边遗址群的发现将雪域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幅度向前延伸，填补了多项时空发现的空白，也填补了“第三极”高原考古多项发现与研究的空白，为研究西藏环境变迁、史前人地关系、人类适应与文化交流、人群栖居与流动模式以及动植物驯化和史前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对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高原腹地最早的人类生存活动和定居过程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阿里文化局 革吉县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张晓凌 谭韵瑶 何伟 靳英帅 杨紫衣 王社江）**

#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

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被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建立东南沿海岛屿地区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 西营遗址距今约7300-6500年，代表了目前平潭岛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陶器以夹砂灰陶、黑陶、红陶等为主，可复原器有圜底釜、钵等，器身饰以绳纹、弦纹等，口沿内壁饰多线刻划纹、贝齿印纹等。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5000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施红衣陶。器表典型纹饰是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镂孔等，口沿唇面压印短斜线或花口则多见。流行圜底器、圈足器、零星的平底器。口沿外侧刻划平行条纹、内侧沿面内凹、唇面呈波浪形。相似的遗存见于闽侯溪头遗址下文化层、金门的富国墩等遗址，尤其与台湾大坌坑文化存在相似性，显示出台湾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关联。东花丘遗址距今约4000-3500年，是遗址群中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代表性遗存。遗物中夹砂绳纹陶与以云雷纹为主要纹饰的印纹硬陶共存，这种现象可能代表了当时平潭岛本地土著文化与来自闽江下流域外来文化之间碰撞、融合的过程。龟山遗址距今约4000-3200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还有一定的泥质陶、印纹硬陶、红衣陶，以及少量原始瓷。陶器施绳纹、弦纹、戳点纹，以及方格纹、云雷纹、回形纹和刻划纹等几何图案。陶器以圜底器、浅圈足器为主，以及少量的平底器，另有形态各异的夹砂红陶支座。大量成组和修复的陶器，为确立龟山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其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中的地位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壳丘头遗址群中各个阶段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明确，发展延续关系明显，存续多个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其中既有以夹砂陶圜底器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持续发展，也有黄瓜山和黄土仑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为我们探讨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传承、交流、互动，以及其代表的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直接材料。



壳丘头遗址功能区分布图

西营遗址陶器

壳丘头遗址陶器

**全面揭露中国东南沿海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西营、祠堂后山遗址的遗迹表现为相对小型聚落形态，以贝壳堆、柱洞、灰坑等生活遗迹为主，生活功能区分布相对集中、紧凑。

壳丘头遗址揭露出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史前聚落形态，发现的柱洞、贝壳坑、石器加工场、火塘等遗迹为居住区，分布于山坡后缘地势较高处，山坡前缘则为垃圾倾倒区。居住区、餐食加工区、手工业区、垃圾倾倒区等功能分区清晰。已发展为中型聚落。

东花丘、龟山遗址时期，发展为大规模、高等级的聚落。揭露出台基、陶片密集堆积层、房址、踩踏活动面、用火遗迹、柱洞、灰坑等重要遗迹。功能分区包括以大型台基、器物坑（堆）和密集陶片组成的仪式性区域；围绕仪式性区域成组的杆栏式建筑组成的公共活动区；公共区之外的建筑和贝壳堆积组成的生活区。表明距今4000-3200年左右，南岛语族人群无论是社会组织形态、生存模式，以及手工业技术水平、精神世界表达均显示出新的文明程度。

**多学科研究支撑下的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体质特征和生计模式探索** 西营、壳丘头遗址发现人骨遗存，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研究的重要、直接材料。西营遗址发现人骨和牙齿，经鉴定属于至少4个以上的个体。人骨直接测年结果为距今约7300年，初步研究表明，平潭史前人群和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族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

各时期遗存发现丰富的海、陆生动物资源。遗址贝壳堆积中发现的贝类种类丰富，其中牡蛎数量最多，其次为泥蚶、文蛤、青蛤等。动物包括龟类、鸟类、水牛、鹿、海豚以及各种鱼类，均属于野生动物，反映出渔猎的生业经济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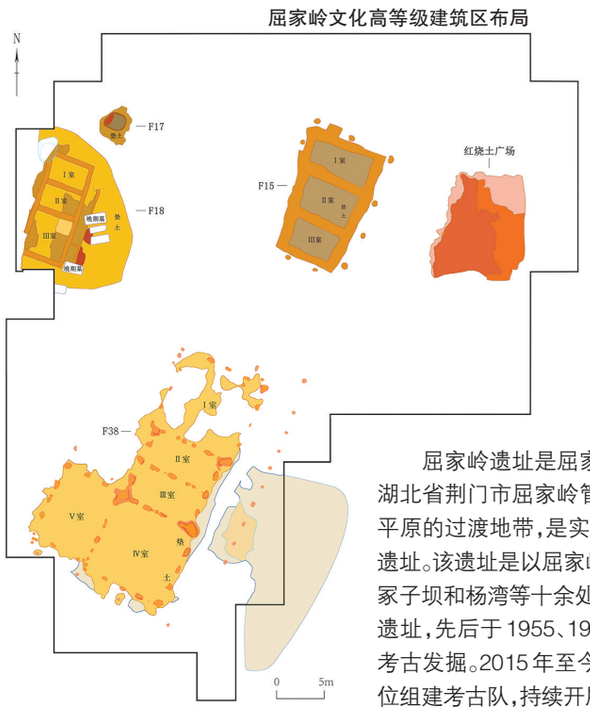
海洋资源背景下的发达农业。西营、壳丘头遗址发现的植硅体水稻遗存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陶片中植物印痕也发现稻、粟、黍痕迹，这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残留物分析同样发现包括稻谷、黍、粟、豆类等农作物淀粉粒，揭示出各个时期海岛史前人群的农业行为。植物考古研究发现，水稻和粟在距今4800-4600年期间传入台湾地区，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扩散提供了新的确凿证据。

上述发现反映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这种特点贯穿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特征逐渐清晰** 平潭岛系列发现显示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海洋性、大陆性兼备的特征，符合南岛语族起源于大陆，并向海洋扩散的逻辑特征，为我们探索南岛语族向外扩散的路径提供了更广的研究视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大陆来源。具体文化特征表现为：以圜底器为典型特征的陶器组合；石器技术发达，可能与木质航海器与杆栏式建筑相关；生计资源类型多样；居址以杆栏式为主；航海技术发达；聚落有明显功能分区，公共空间明确；航海、渔猎的生计模式导致仪式性公共活动发达。

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重大发现为代表的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新进展，有力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为我们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生计模式、迁徙规律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 厦门大学 平潭综合实验区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 执笔：周振宇 危长福 张闻捷 陈盛 黄艳敏）**

# 考古新发现 屈家岭遗址 湖北荆门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 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

新近考古工作表明，屈家岭遗址历经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等史前文化时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900-4200年。

油子岭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屈家岭，面积约38万平方米。至油子岭文化中晚期，发展形成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共四处地点为一体的大型遗址，分布范围约105万平方米，为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并确认水利系统、墓葬区、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等。

这一时期，屈家岭、冢子坝分别有其独立且与之对应的居址和墓地，意味着两处地点既是其各自特定人群的生活场所，又是他们死后的葬身之地。以屈家岭为例，自北向南依次为油子岭文化的成人墓地、婴幼儿墓地（瓮棺葬群）、居住区和陶器生产区。在冢子坝，中部台地被规划为居住区，西部坡地则分布有油子岭文化成人墓地。

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扩展至284万平方米，环壕围合面积（含环壕）约90万平方米，发现大型水利系统、高等级建筑区、墓葬和铜矿石等遗存，探索到史前稻田的分布范围，出土已知最早的高温黑釉陶。

石家河文化时期，尽管出土铜矿石等重要遗存，但聚落规模明显缩小，分布范围仅为18万平方米。

### 发现多组因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

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多组水利系统，对熊家岭、郑畈两处呈东北至西南向对角线分布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

**熊家岭水利系统** 熊家岭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其西北部、南部紧邻殷家岭和钟家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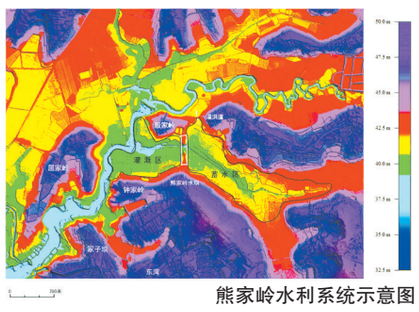
熊家岭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筑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以拦蓄水体。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南北长约180米。水坝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的研究工作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26米，出口北抵青木垱河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将呈南高北低走势且自然分布的基岩面用作溢洪道，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解剖性发掘显示，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宽度为10.2米，晚期坝的宽度为26.6米，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在早期坝的使用过程中，坝体东侧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存在包含细小烧土颗粒的灰烬层，晚期坝体即叠压在灰烬层上。灰烬层中的炭化荒草种子表明，增筑行为当发生于秋冬季的枯水期。出土遗物、测年数据显示，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绝对年代约4900-4800 cal BP。早期坝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范围为5100-4900 cal BP，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

早晚两期坝体堆积明显经过人工拍打、夯实或加固，局部位置揭露出因拍打、夯实而形成的“痕迹面”。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掺有禾本科植物根茎，应属原始的“加筋工艺”。此外，在早晚两期坝体堆积中发现“草裹泥”的痕迹。

对熊家岭水利系统的溢洪道入口进行了整体揭露，发现大范围自然分布的泥质页岩基岩面，整体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基岩面中部位置存在南北向沟状下切迹象，推测人为对基岩面进行了平整和加工，以便宣泄洪水。同时在溢洪道入口的基岩面上发现一些明显往出口方向（南向北）倾斜的页岩岩板，应为宣泄洪水时水流冲击所致，是溢洪道使用的直接证据。

**郑畈水利系统** 郑畈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西南角，其北部、东北部为杨湾和冢子坝，目前已确认水坝、蓄水区和溢洪道。郑畈水坝亦属土坝，为连接南北两端山体而营建的人工设施，现存坝顶高约2.3米、宽约5.2米，坝底宽约10米、长约580米。水坝以东，南北山体间的低洼区域为蓄水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溢洪道入口宽约58米，位于蓄水区的西北部缺口处，出口西抵青木垱河下游。解剖性发掘表明，坝体堆积仅一期，其建造工艺、构筑方式、堆积特征与熊家岭水坝早期坝高度一致，年代与熊家岭早期坝相当。


熊家岭水利系统示意图

### 史前建筑技术的全新认识

2021至2023年度考古发掘，揭露一座面积约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型宫殿式建筑F38。平面呈东北至西南向“曲尺”状，自北向南分为四间，南端向西折出一间。F38主体面积约340平方米，外围设施（或为廊道）现存面积约170平方米。发现有黄土台基和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迄今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奠定了史前基础，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位于建筑中部两分间拐角处的“磉墩”体量巨大，最大者长约3.3米，宽约1.7米，深约1.5米。“磉墩”的营建流程为：首先挖走预置“磉墩”区域的原有软基层（油子岭文化层），在高低不平的起建面上堆筑纯净的黄土台基，锚定“磉墩”布设点位后在台基上挖深坑，再烧烤坑壁形成硬结面，后用红烧土混合黏土及少量焚烧过的猪骨填满深坑形成“磉墩”。

大型建筑F15和F18、仓储类建筑F17和红烧土广场，皆位于F38的北部，都分布在屈家岭南部台地，处于同一地层单位，年代均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证明该区域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区。

### 多学科综合研究新进展

屈家岭遗址考古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深度合作，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在植物考古、考古年代学、残留物分析、冶金考古、制陶技术、土壤微形态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 学术意义

**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证** 距今5300年前后，勃兴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开启了强势扩张，北上随枣，南下洞庭，西进峡江，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屈家岭遗址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本年度考古揭示的熊家岭水利工程即发轫于这一时期，可以认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大型水管理设施，加上最早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高度，也进一步阐释了油子岭文化强势扩张的动因。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在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规划、营建的水利系统被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并经过改造升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规模从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规整的环壕设施、高超的建筑工艺，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

**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与方式** 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屈家岭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大型中心聚落和水利工程设施，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陶洋 张德伟 曾汭 林嘉莹）**